



《陕甘苏区略图》： 长征落脚点的历史见证

在甘肃省档案馆藏着一份珍贵的革命档案，是一份手工绘制的《陕甘苏区略图》。这份档案为战时手绘纸质地图，版面简洁朴素，标注清晰，纸面留存着岁月侵蚀的斑驳痕迹，左侧附战时说明文字，左下角钤印“支队政治部印”，是红军长征途中留存的一手珍贵实物资料。略图由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绘制，是榜罗镇会议作出把陕北作为落脚点重大战略决策的直观载体与鲜活见证。

杨生俊



1935年9月29日，陕甘支队政治部绘制的《陕甘苏区略图》（甘肃省档案馆藏）

为万里长征明确了最终航向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征程。他们最初计划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随着敌情的发展变化，先后把川黔边、川滇黔边、川西或川西北、川陕甘作为落脚点。1935年9月，俄界会议曾作出向中苏边境靠近、建立临时根据地的部署，但全国革命形势瞬息万变，红军亟须立足实际调整战略方向，彻底摆脱流动作战的被动局面。

9月17日，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顺利进入甘肃境内，彻底打开北上通道。次日，部队进驻哈达铺。在哈达铺期间，党中央通过搜集梳理各类报刊信息，首次全面掌握了陕甘苏区的存续现状、地理范围和武装力量情况，得知陕北留存着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这为迷茫中的红军指明了前行方向。北上部队在这里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统一指挥、轻装北上，为后续战略决策落地做好了军事准备。

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甘肃通渭榜罗镇，中央机关同步驻扎于此。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即榜罗镇会议。会议深刻研判国内外革命形势，精准把握民族危机加剧、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时代背景，果断调整此前战略部署，正式作出重大决策：改变俄界会议北上靠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方案，将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定于陕北，以陕甘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开展抗日斗争的大本营。会议确立的“立足陕北、保卫扩大苏区、领导全国革命”的战略方针，为后续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陕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北上抗日与播撒红色火种

9月28日，陕甘支队在榜罗镇召开连以上全体干部大会，传达榜罗镇会议精神，深入解读北上陕北、立足苏区、领导抗日的战略意义，对后续行军作战、群众工作、队伍整顿作出全面部署。此次大会是长征途中一次重要的政治动员，全体指战员明晰革命方向、坚定北上信念，提振了部队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的战斗意志。

为贯彻落实会议战略部署，陕甘支队迅速推进军事行动与群众工作。9月29日，部队一举攻占通渭县城，这是红军走出雪山草地后占领的第一座县城，为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提供了难得的休整补给之地。进驻通渭期间，红军严格执行革命纪律，积极开展群众工作，走访安抚百姓、筹措军需粮草、整顿队伍作风、传播革命思想，在陇中大地播撒下红色火种，赢得了当地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心拥护和支持。

当晚，毛泽东在通渭文庙街小学接见第一纵队第一大队先锋连全体指战员，满怀壮志首次公开朗诵《七律·长征》，以雄浑磅礴的诗句回望万里征程的艰辛与荣光，抒发了“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喜悦之情，极大凝聚了全军斗志、振奋了革命精神，为红军奔赴新征程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

为让全体指战员直观掌握苏区形势、明晰行军路线、坚定革命信心，陕甘支队政治部立足战时需求，依托搜集的报刊资料，精心手绘完成《陕甘苏区略图》。这份略图摒弃繁复制式，以简洁直观的符号、清晰明确的标注，完整呈现陕甘苏区范围、游击区域、县城据点、交通要道，成为连队政治教育、行军导航作战的重要资料，让全军将士看得见革命阵地、摸得着奋斗目标，为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提供了具象化依据。

档案略图尽显战时革命本色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革命形势陷入低谷，南方各大革命根据地相继沦陷，多数红色武装被迫转移，唯有陕甘革命根据地完整存续，成为彼时中国革命“硕果仅存”的战略支点。1935年2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陕北革命根据地整合统一，正式形成陕甘苏区，涵盖陕北、陇东大片区域，拥有成熟的苏维埃政权、稳固的群众基础和活跃的革命武装，为绝境中的中国革命保留了珍贵的存续发展空间。

在党和红军历经长征磨难、急需稳固落脚点的危急时刻，陕甘苏区的存在，从根本上解决了红军无后方依托、无立足阵地的难题。这片扎根西北的红色沃土，不仅为疲惫的红军提供了休整、补充、发展的坚实阵地，更为党中央立足北方、统筹全国革命、引领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重要战略平台，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浴火重生的关键依托，而《陕甘苏区略图》的留存，成为这一历史价值最直观、最鲜活的实物佐证。

这份馆藏略图尽显战时革命本色，图纸标注实事求是、务实严谨，清晰区分苏区、游击区、县城、省界、交通线，精准勾勒出陕甘苏区层层拱卫、纵深延展的红色版图。图纸左侧备注制图依据与使用要求，既客观说明参考民间报刊资料、存在细微偏差的局限，又明确要求放大绘制、用于连队教学，充分彰显了红军求真务实、严谨细致、学以致用、学以致用的革命作风。图纸标注的南梁、照金、吴起等主要苏区据点，以及庆阳、合水、正宁等陇东红色区域，印证了陕甘苏区的核心区位与政权布局，为研究苏区历史、长征战略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一手史料。

据《学习时报》

左权“促放东北军”

1936年6月，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不满蒋介石对日妥协、排除异己政策，联名向全国发表反蒋通电，组成西南联军出兵湖南，宣布反蒋抗日，是为“两广事变”，引起被迫在西北“剿共”的东北军共鸣。

19日，红一军团代军团长左权致电红一军团第4师师长李天佑，政委黄克诚并报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对整个东北军应以努力政治争取为原则，特别在目前两广出兵、抗日浪潮急剧发展下更为重要。我前线与东北军接近部队，应耐心地、恳切地喊话，并多散发宣传品。”

左权的建议与前线官兵的政治攻势，得到彭德怀的充分肯定。但是，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趁张学良去南京开会未回之机，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攻占了三岔、阜城、马岭，向曲阳镇推进。7月2日，彭德怀致电李天佑、黄克诚：“对东北军在原则上不与之决战，多从政治上争取。”但是，何柱国继续北犯。

这时，左权建议彭德怀：“一打一拉，一拉一打！好说不行，就得歹说！也许好说加歹说，才能影响东北军。”彭德怀深以为然，遂令红一军团第2师由北向南，第4师由南向北，南北夹击何军。结果，一举歼灭何部一个骑兵连。左权指示：对所俘官兵进行深入的抗日教育，全部归还武器，全部予以释放。临去时，被俘官兵依依不舍，说：“我们再要和红军打仗，就不算是中国人！”

彭德怀非常重视左权部对东北军进行军事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的经验，“在彭德怀的号召下，野战军从上到下对敌方开展了争取工作。他们给敌方官兵写信，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交战时，向对方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被俘的敌军经过教育后，归还武器，全部释放”。

很快，在红军同东北军对垒的前方，两军渐渐地熟悉起来。白天阵地上鸦雀无声，夜晚，抗日歌声从双方的阵地上传出来，悲愤激昂。以后双方官兵在阵地上开联欢会，变成要求抗日救亡的朋友，建立了友邻关系，体现了抗日民族团结的感召力。

夏明星 据《人民政协报》

丰子恺以笔控诉日寇暴行

1937年11月6日，日机突袭没有军队驻扎的石门湾。这个江南小镇是丰子恺的故乡，5年前他用积攒的稿费在此建起一座小楼，取名“缘缘堂”，被他视为安身立命的归宿。

这一天，炸弹如雨，街巷顿时乌烟瘴气、鸡飞狗跳。丰子恺将一家老小聚拢屋内，“墙壁摆动，桌椅跳跃，热水瓶翻落在地，玻璃窗齐声大叫”。两个小时后敌机飞走，大街上尸首横陈、一片狼藉。

当晚，丰子恺率亲族老幼10余人乘船逃离。从此一家人踏上长达8年的流亡之路，经杭州、桐庐、兰溪、衢州，辗转来到江西萍乡。

1938年2月9日，噩耗传来——缘缘堂全部焚毁。数千册藏书荡然无存，弘一法师留下的画具画箱也化作灰烬。丰子恺愣在原地，悲痛欲绝。

但这位从不骂人的书生，终于在他的《还我缘缘堂》一文中爆发了。他痛斥侵略者为“狗彘豺狼”，同时写道：“沿途看报某处阵亡数千人，某处被敌虐杀数百人，像我们全家逃出战区，比较起他们来已是万幸，身外之物又何足惜！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乎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我的前途尚有希望，我决不为房屋被焚而伤心……”

一篇不够，他又提笔写下《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追忆昔日温馨生活，痛斥侵略者毁灭文化家园的罪行；再写《辞缘缘堂》，深情告别故园，将个人命运与民族苦难紧紧连在一起。三篇文章，一篇比一篇沉痛，字字是泪、句句是火，喊出了心底最深处的悲愤。到达汉口后，他感于民气旺盛，决意“拿五寸不烂之笔来参加抗战”。

直到1947年，丰子恺才回到阔别10年的故乡。

周星 据《人民政协报》